

法家教育言论选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

法家教育言论选注

广西教育学院
《法家教育言论选注》小组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法家教育言论选注

广西教育学院《法家教育言论选注》小组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书号：7113·287 定价：0.22元

毛主席语录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对法家教育思想加以批判的总结，吸取其进步的东西，这对研究我国教育史上两条路线斗争，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学校改造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同奴隶主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形成了儒法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站在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鼓吹复辟倒退。他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疯狂地推行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以商鞅、

荀况、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则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对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法后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等主张，对儒家的“法先王”的复古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为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大造舆论，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并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儒法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教育上来。孔丘、孟轲等儒家代表人物，打着“私学”的招牌，广收门徒，拼命地占领教育这块阵地。他们宣扬“述而不作”，“守死善道”，叫嚷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企图通过教育，培植一批维护奴隶制的“圣人”、“贤人”，扩大复辟奴隶制的社会基础。商鞅、荀况、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在进步、革新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对儒家的反动教育路线进行了斗争。他们指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是“贫国弱兵之教”，儒学是“愚诬之学”，应该革除。荀况还痛斥孟轲为“奸人之雄”，韩非则针对儒家“私学”成群，儒生散布的复辟言论到处泛滥的现实，公开提出要对这些反动言行采取严厉的措施：“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教育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进行专

7
政的极其明确的语言。他们要求铲除这些复辟奴隶制的垃圾，把儒家长期独霸的教育阵地夺过来，使之成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在于用哪个阶级的世界观教育人、改造人的问题。这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企图各自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斗争着的双方都力求在教育的内容方面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先秦儒家为了复辟奴隶制，他们用诗、书、礼、乐，特别是“礼”来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所谓“以礼教人”，实质就是企图用奴隶主阶级的仁义忠孝等道德规范，调节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防止奴隶们“犯上作乱”，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先秦法家则在揭露儒家“以礼教人”的反动实质的同时，提出了“以法为教”的主张。所谓“法”，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制，如荀况所说的那样：要“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也就是剥夺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对奴隶主阶级掌握的财产、权力进行再分配。这显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为了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先秦法家在尖锐地批判儒家轻视耕战的反动思想的同时，特别强调以耕战教民。商鞅指出，儒家的《诗》、《书》、《礼》、《乐》是吸人血的虱子，建议把它烧毁，把“法”和耕战的思想作为教育的

内容。荀况则主张“隆礼义而杀诗书”，他所说的“礼”，即“法之大分”，就是“法”的根本原则，跟孔丘的“礼”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所谓“隆礼”，实质就是“隆法”。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指出“儒以文乱法”，儒家是“五蠹”之首，儒生们“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是“法败”、“国贫”、“世乱”的根源，必须铲除。他还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教育规定了一条总纲：“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可见，摈弃儒家的反动教育内容，主张“以法为教”，重视耕战，这是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在教育内容上的共同主张。

“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而这个方向，“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列宁全集》第15卷第438页）教师是一个阶级的教育路线的具体执行者，因此，以什么人为师是儒法两家的教育领域内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孔丘设坛授徒以后，儒生们都以“师表”自居，他们鼓吹“师道尊严”，为的是要人们“尊师重道”，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以便于进行复辟奴隶制的罪恶活动。法家代表人物在这方面跟儒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们提出了“以吏为师”的主张，即以执行法治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官吏作为教师，以便向受教育者灌输地主阶级的思

想，推行法治路线。

一定的教育目的，要通过一定的教育方法去实现。儒家主张死啃书本，皓首穷经，“内省”，“修己”，闭门修养，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教育方法，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影响极为恶劣。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对人们，尤其是对青少年拚命鼓吹“修养”、“韦编三绝”，就是承袭其老祖宗的衣钵，妄图把青少年一代“修养”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先秦法家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儒家这种反动的教育方法。他们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假借于物”、“求之而后得”的，所谓“圣人”，不过象“积土成山，积水成渊”那样，是由于后天坚持学习和实践，一点一滴地积累而达到的。因此，他们主张不但要读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参加实践。“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把“行”作为学习过程中的最终目的。

教育为哪个阶级培养人材，是教育为那个阶级服务的根本问题。孔丘为了掩盖他搞教育的反动目的，打出了“有教无类”的招牌，为奴隶主阶级培养继承人而奔走呼号；同时，还以“学而优则仕”为诱饵，宣扬“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孟轲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叫嚷“善战者服上刑”，对提倡耕战的人要加以重刑。他们鼓吹

“读书做官”，反对学生参加农业生产，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过是复辟狂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社会蛀虫。先秦法家为了建立、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他们公开声明，要培养的是“好法而行”、敢于蔑视“先王之道”、更礼变法的革新家，而且还要求这些革新家必须具有耕战的本领。因此，商鞅主张“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荀况针对孔丘的言论，提出“非其人而教之”，无异于给敌人送粮食，把兵器借给盗贼，并且主张“学者非必为仕”，还认为培养出来的人必须“口能言”、“身能行”；韩非则认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他们都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选拔坚持法治路线的人材。

总之，先秦法家在同儒家的斗争中，已逐步建立了一套为自己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教育理论，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是，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它也就逐渐走向反动，在思想上由反儒尊法走向反法尊儒，法家教育思想也就受到历代反动派及尊儒反法的知识分子的歪曲和攻击。他们胡说什么“法家没有教育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把“教育和政治混为一谈”等等。那些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也用这种陈腐的观念去看待法家的教育思想，这是十分错误的。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总是和一定阶

级的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列宁全集》第28卷第69页）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毫不讳言，他们的教育要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和儒家用陈词滥调来掩盖其教育主张相比，这表明了地主阶级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的革命性。从而也恰好说明，儒家用种种超阶级的言辞来掩饰它在教育领域里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正是其腐朽、没落的表现。

二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鸦片战争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农民起义和斗争的推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封建社会的教育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尽管各个朝代的历史条件不同，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表现得错综复杂，但总的说来，仍然是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的斗争。

秦至西汉初期，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企图复辟奴隶制。因此，当时儒法两条教育路线围绕着复辟与反复辟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对儒家的《诗》、《书》等经典，以及打着办“私学”的招牌，

从事复辟奴隶制罪恶活动的反动儒生，实行了“焚书坑儒”，重申教育必须“学法令，以吏为师”。他在教育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了专政，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秦始皇不但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教育改革实践家。他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承秦制。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在政治上推行法治，在教育方面基本上继承了秦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路线。但武帝死后，以工商奴隶主的代表霍光为后台的贤良、文学这些儒家忠实门徒，却极力反对这条路线，重弹“以礼教人”的老调，胡说什么推行孔孟的“仁义道德”的“教化”，是“百世不易之道”。贤良、文学这些倒行逆施的叫嚣，受到了桑弘羊等法家代表人物的严厉驳斥。桑弘羊认为教育必须“因时而行”，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复古倒退。他高度赞扬商鞅的教育主张使“秦人大治”，称颂秦始皇“焚书坑儒”，指出儒家“以礼教人”只能使国家“危不能安，乱不能治”。

桑弘羊还继承先秦法家重“耕战”的教育思想，强调“安国利民”的耕战教育。他批判贤良、文学这些儒生“能言不能行”，轻视实践的反动说教；指出他们只学“不验之语”，“不耕而食，不蚕而衣”，

游手好闲，欺骗百姓，从而“夺农妨政”，是世乱的根源，社会的祸害；驳斥了贤良、文学的“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以仁义导之”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教军民“以义伐不义”，这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都有积极的意义。

汉元帝以后，地主阶级逐渐从尊法反儒走上了尊儒反法的反动道路。特别是汉章帝以后，把儒家经学与谶纬神学结合起来，儒家思想被抬到独尊的地位，儒术成了封建教育的唯一内容。面对这股反动逆流，东汉初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尖锐地批判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和教育路线，斗争的矛头直指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他揭露孔孟之徒是一群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寡廉鲜耻、男盗女娼、“贪官好仕”的伪君子，公开对孔老二的唯心主义谬论提出“追难”，并且认为，批判孔学“何伤于义”、“何逆于理”。他指出，孔老二的说教不过是“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漏洞百出的破烂。如果只知把孔孟的书背得烂熟，就会“闭心塞意”，结果不过是行尸走肉。针对孔孟的反动说教，他提出要培养“能知大圣之事”、“晓细民之情”的人材的主张，提倡“多闻博识”。王充还从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批判孔孟之徒宣扬的“生而知之”等唯心论的先

验论。他在《知实篇》中举了十六条例子，否定孔老二是天生圣人。在《实知篇》中还指出要真正有知识才能，必须“目见口问”。他十分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并批判孔孟的违实不引效验，只图花言巧语装扮门面而带来的祸害。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宦官专权，藩镇跋扈，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者不断侵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造成了唐王朝统治的深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更为激烈。以王叔文、柳宗元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积极推行法家路线，批判儒家卫道士韩愈的“道统”说，当时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主要是柳宗元对韩愈的“道统”说的批判。

韩愈的“道统”说，沿袭“先王之道”，以儒家的“仁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主张恢复“先王之教”，以《诗》、《书》、《礼》、《乐》为教材。柳宗元同韩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认为那些儒家的所谓经传，对于治国的道理很少说得清楚，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胡言乱语；那些迷信古书，崇拜古人的儒生是一些“拘儒”，“瞽生”。他指出，教育的任务是要培养“利于世”的、具有真才实学的改革家，而不是“泥古妄言”的俗儒；要“秉其正以抗于世”，敢于坚持真理，反对错误潮流，而不是“随俗浮沉”的庸

人。

韩愈为维护官僚大地主的教育特权，承袭孔孟的“天命论”，胡说“上者可教，下者可制”，贩卖“上智下愚”的黑货。柳宗元以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痛斥韩愈以“天命”吓唬人，是“大惑”、“大谬”。他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后天勤奋学习得来的，因此他提倡既要注意读书，又要重视实践。

韩愈狂热鼓吹儒家的“师道尊严”，胡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是“道”的体现者。柳宗元嘲笑韩愈“抗颜而为师”。他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研究。学生对老师说的话要“自择”，不能盲目崇拜。老师教学生要诚心诚意，不能摆架子。当然，柳宗元所讲的师生关系，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革命的师生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但就破除当时教育领域的孔孟之道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更加走下坡路。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内外交困。面对这种形势，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三不足”的精神，推行一条革新路线，实行变法。在教育方面，则积极进行改革，提出一条尚实用，术专门，兼文武，重实践的培养变法人材的教育路线，来为他的革新政治路线服务。

王安石在变法中感到“当今之急，在于人材而已”。他执政后，首先改革科举制度，罢明经，废诗赋，实行“时策”考士的办法，以法律政令和审理案件作为考试内容，并规定由进士和诸科出身的，要参加“律令大义或断案”的考试，合格后才能委派官职。同时，改革太学教育制度，大办学校，扩大招生，撤换一批儒家教官，选派一批拥护新法、年轻有为的教官。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官僚大地主对教育领域的垄断，选拔和培养了大批的变法骨干力量，对发展当时的教育事业有重大意义。

为了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材，王安石改革了儒家的教育内容，在废除“先儒传注”，批判《春秋》为“断烂朝报”的同时，把《三经新义》作为全国的标准教材，把《字说》作为儿童的启蒙课本。

王安石继承前期法家的耕战教育思想，提倡学生既学文又学武，主张多读书，诸子百家，无所不读，注重调查，不论农夫、女工，无所不问；重视实践，规定武学要演习兵法，医学要临床实习。有力地批判了宋儒鼓吹“德性之知，不假闻见”的谬论。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自始至终都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攻击和破坏。他们攻击王安石改革教育是“大患”，“坏了后生学者”，是“以一家私学，欲盖先儒”。面对顽固派的攻击，王安石表

示要“力战天下之人，与之决一胜负”。但宋神宗一死，司马光上台，王安石的改革措施，统统被废除，反动的儒家教育路线复辟了。

自明代中叶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后，中国封建社会更为衰落，社会矛盾更为激烈和复杂化。但是，基本的矛盾仍然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贵族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加紧镇压农民起义，进一步乞求于孔孟之道，把宋明理学作为加强思想统治的工具。它的教育路线，就是为挽救其没落的反动封建制度服务的。面对宋明理学泛滥的局面，在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地主阶级内部一些具有法家思想的政治家和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同时相应地对宋朝程颐、朱熹和明朝的王守仁等唯心主义理学家所宣扬的孔孟之道和儒家教育思想也进行了批判。明穆宗隆庆时期，具有法家思想的政治家张居正当政，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防的措施。在教育方面，他主张选拔有真才实学的革新人材，指出那些“动称三代”的“腐儒”，其言论都是“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同时，在行动上则“清庠序，多所澄汰”（《明史·张居正传》），封闭了一批儒家书院，淘汰了一批“虚谈贾誉”、胡作非为的儒生，给儒家